

一隻看不見的手

——亞當斯密《國富論》導讀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助理教授

許恒禎

《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年出版，是蘇格蘭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經典作品。

亞當斯密出生於歐洲政治思想史上最為繽紛多彩的啟蒙時代。當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等充滿智慧的自然科學家開始挑戰宗教教條，尋找對自然現象的理性解釋。亞當斯密跟這些科學家一樣，也試著尋找因果關係，不過他的對象是人，不是物理力量與星球。

一生與母親相依為命，終生未娶的亞當斯密是個長相怪異之人。他有個大鼻子，腫脹的眼睛，突出的下唇，偶爾會神經質地抽動身體，還有一點口吃。他有一次承認自己長得不怎麼樣，說：「在著作之外，我是個醜人。」亞當斯密曾就讀牛津大學，他抱怨那裡的教學差勁。

他後來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教授邏輯學與道德哲學，其教學風格不同於他所抨擊的牛津大學昏昧學究。因為有著清晰的講授及對學生的關懷，他很快就名滿天下，在演講、授課、主持會議之餘，還兼任院長。

不過，亞當斯密從未教過經濟學。事實上，他在求學時期從來沒有上過經濟學的課程，當然，那個年代也沒有任何人上過。因為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學術界一直認為經濟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劍橋大學直到 1903 年才建立一個獨立於道德科學的經濟學課程。

現代經濟學之父

亞當斯密也有心不在焉的小故事。有一天，著名的政治家湯森（Rt. Honorable Charles Townshend）來到格拉斯哥，亞當斯密帶他參觀一家製革工廠。他在對湯森大談自由貿易的好處時，一不小心掉進充滿噁心黏糊的大池子裡。工人把他從黏糊裡拉出來，剝掉身上的衣服，替他披上一條毯子。不只如此，亞當斯密擔任海關專員時，有次因出神而在公文上簽名時不自覺寫成前一個簽名者的名字。他也曾在清晨起床，穿著睡衣一路走了 15 英里後才從教堂的鐘聲中回神。還有，亞當斯密在陌生環境發表文章或演說時，剛開始會因害羞而頻頻口吃，一旦熟悉後便恢復辯才無礙的氣勢，侃侃而談。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在事後坦承，自己的生活老是一團亂。

此外，讓讀者最為熟知的亞當斯密之主張是市場供需這「一隻看不見的手」導引著每個人生產什麼，以及該商品或服務該以什麼價格與數量出售。當然，貿易並不總是依照著看不見的手，有時會有國內與國際貿易限制。國內貿易的限制，例如天然資源的限制使得業者無法加入有利可圖的產業、商人彼此協定哄抬物價；至於國際貿易的限制，則有關稅與進口配額等，這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後的貿易戰都看得到這些手段。亞當斯密也曾深思過一國的嬰兒產業是否要保護的議題。

《國富論》分為 2 卷，共 5 部。第一部有 11 章，主要內容是分

析形成與改善勞動力生產能力的原因，並分析國民財富分配的原則。第二部有 5 章，主要內容是討論資本的性質與積累方式，分析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取決於工作的性質。第三部共有 4 章，主要內容是介紹造成當時城市的工、商業比較受到重視，而農業比較受輕視的原因。第四部有 9 章，主要內容是列舉與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在此駁斥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第五部有 3 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君王與國家的角色，以及國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為了全民還是只為少數人服務，如果為全民服務有多少種開支項目；為什麼當代政府都有赤字與國債，這些赤字與國債對真實財富的影響等。

讓更多地區聯結在貿易網絡中

亞當斯密很贊同分工對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性，並以別針來讚揚分工。1 個工人即使盡了一切努力，1 天頂多作出 1 枚別針，但是，如果把工作流程分割為 18 個部分，1 個工人 1 天可製造出 4,800 枚別針。他認為透過專業化與分工，有三種方法可以增加產出：第一，勞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可以發展出更熟練的技能；第二，勞工不必浪費時間於任務的轉換；第三，專業化的勞工更有可能發明出新的器具，來輔助他們每天所專注的工作。分工如此美好，但受限於交易範圍，如果能改善水路交通，讓更多的地區聯結在貿易網絡中，國家的財富便能大大增加。

他的貨幣理論也很經典。貨幣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

有貨幣是為了購買其他物品。當以物易物發展到以貨幣為媒介交換後，商品的價值就用貨幣來衡量。這時，便產生了貨幣的另一個功能——價值的尺度。他當然也有談到貨幣的儲藏功能與支付功能等。不過，他特別強調貨幣的流通功能。

價值論也是亞當斯密的重頭戲。他指出，價值涵蓋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前者代表特定財貨的效用，後者代表擁有此一財貨取得另一財貨的購買力。一個物品如果有很高的使用價值，通常具有比較低的交換價值，反之亦然。例如水與鑽石，水具有很高的使用價值，每個人每天都需要它。但是，我們幾乎用水交換不到什麼物品，鑽石則相反。

亞當斯密的分配論是指勞動工資、資本利潤與土地地租之決定理論。他指出，儘管雇主擁有壓低工資的力量，工資仍然有其最低水準，此一最低水準是勞動者必須能夠維持其基本生活。假定社會上工人的需求增加，工資將高於最低水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國的國富、資本或所得增加將促使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則促進人口增加。工資隨著職業特性而不同，大致上有五種決定因素。第一是舒服程度，職業本身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的，而其難易、污潔與尊卑各不相同；第二是職業學習有難有簡單，學費有多有少；第三是安定性，工作有安定的，也有不安定的；第四是職業所需擔負的責任有重有輕；第五是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再來談利潤。資本利潤之高低如同勞動工資，決定於社會財富之增減，資本增加固然可以促使工資上漲，卻使得利

潤為之下降。亞當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資同一事業，因為彼此互相競爭，自然使得利潤率降低。最後談地租。地租是指對土地使用所支付的價格。亞當斯密認為，地租高低與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場遠近有關。

駁斥重農主義與重商主義

亞當斯密在經濟思想上的重大主張是駁斥重農主義（Physiocracy）與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但他主要的敵人是重商主義。他認為重農主義的重要性不如重商主義。他在法國期間深刻認知了重農主義在法國的流行。信奉重農主義的國家認為，土地生產物是國家收入與財富的唯一來源，古印度、古中國、古埃及都是某種程度的重農主義國家。他們重視土地改良、輕視商業貿易與製造業。這樣的學說帶給人們豐富食物，卻使得國家的資產增加緩慢。亞當斯密指出重農主義學說最大的謬誤就是將工匠和製造業工人視為非生產階級。此外，他曾從不同層次去痛斥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是根據錢幣及重金屬來衡量財富，但是亞當斯密認為，真正的財富應該以一般家庭的生活水準來評斷。畢竟，成袋的黃金不一定可以換為成袋的食物，消費者的經濟狀況才是國家財富的衡量標準。此外，個人動機與發明、創新能刺激經濟繁榮，重商主義的獨占與保護則會癱瘓國家經濟。總之，現代經濟學可說是從亞當斯密譴責重商主義中產生。

對於國家或君主的角色，亞當斯密認為君主最重要的義務就是保

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力與侵略。這種義務只能借助兵力來完成。兵力使用費用又分為平時與戰時，而二個時期的費用又社會狀態不同以及進化時期不同而大有歧異。國家對於國防軍備可以採用二種方法，第一種民兵，用一種極嚴厲的法令，施以強迫軍事訓練；第二種常備軍。此外，軍隊人數不應超過一國人口的1%。

第二個義務是保護人民，使社會中任何人都不會受到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也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在狩獵民族社會的時代，人民財產有限，當然用不到固定的審判官與司法行政機構。沒有財產的人們頂多傷害彼此的名譽與身體，卻得不到什麼利益。到了有大財產的時代，富者隨時都有不可測知的敵人在包圍他，想避免敵人的侵害，只有依靠強有力的司法官的保護，而司法官存在民政政府中。一個民政政府中，必然要先取得人民的服從。人民之所以會形成服從性，似乎有四種自然原因或情況。第一個原因為種種個人資質的優越，包括體力的優越、容貌的優越、動作敏捷的優越、智慧的優越、道德的優越、正義性的優越、剛毅性的優越、克制性的優越等；第二種原因是年齡的優越；第三種原因是財產的優越；第四種原因則是門第的優越。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劃分似乎是社會進步、社會事務增加的結果。因為社會事務日益增多，於是擔當這些任務的人就不能分心到其他方面。此外，司法權如果不能脫離行政權而獨立，公道就會被世俗政治勢力所左右。總的來說，司法權不但有與行政權分離的必要，而且有完全脫離的必要。審判官不應該由行政當局任意罷免，審

判官的薪水也不該隨行政當局的意向而變更。

君主有建立並維持公共機關與工程的義務

第三個義務是建立並維持公共機關與公共工程。一國商業的發達有賴於良好的道路、橋樑、運河與港灣等公共工程，建造這些公共工程的費用在於他們自身提供足以支付自己費用的特別收入，而無須增大社會一般收入的負擔。此外，還有青年教育設施的費用，這些教育機構的經費可以由自身來支付，也可以來源於捐贈。再者，另有對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設施，主要是指宗教教育的設施。

一個君主除了國防、司法與公共工程的費用外，還有維持其尊嚴必須的費用。這些費用會隨著社會發展時期的不同與政體形態的不同而不同，在富裕的社會當然所費必然較多。

在政府收入方面，亞當斯密提出了「四大賦稅原則」。第一是公平，一國國民應該盡可能按其能力支持政府，亦即國民應按其在政府保護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納稅；第二是確定，各國民應當繳納的稅捐須確定並不得隨意變更，納稅時期、繳納方法、應付稅額等，都應該對納稅人清楚宣示；第三是便利，一切稅捐都應在最適合於納稅人的時間與方法收之；第四是經濟，每一稅捐都應該善加設計，務使公民繳付國庫之外，在他的財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變動。

《國富論》對經濟學的重要性

亞當斯密開創了經濟學這個領域，接下來才能有後繼的經濟學者開展這門學問。像是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的比較利益法則（Comparative Advantage）就是修正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法則（principle of absolute advantage）；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邊際學派（Grenznutze School）具體回答了亞當斯密有關鑽石與水的討論；其後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亞當斯密的強力信徒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貨幣學派（Monetarism）、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還有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等，這些主張不論是對亞當斯密思想的延續開展或是批評，都是基於《國富論》的內容，可見亞當斯密與《國富論》對經濟學的重要性。

參考資料

- 亞當斯密著，殷梅譯，《圖解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臺北：海鴿文化，2013。
- 陶德·布希霍茲著，吳四明譯，《經濟學的第一堂課》（*From Here to Economy*），臺北：先覺，2002。
- Todd G. Buchholz 著，馮勃翰譯，《經濟大師不死：因為被你搞懂了》（*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臺北：先覺，2000。